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八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四七期 ——  
（二〇〇三年七月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307b）

---

- 【史海钩沉】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  
——写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三十周年的日子里（二之二） 贾兰勋
- 【学术争鸣】为刘少奇一辩——与王湘先生商榷 徐明旭
- 【当事者说】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 纪坡民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侯 5c 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史海钩沉】

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  
——写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三十周年的日子里（二之二）

• 贾兰勋 •

（续上期）

◇ 主席接见

从 1966 年的杭州会议到造反派公开揪斗少奇同志，这中间毛主席接见了少奇同志一次。1967 年 1 月 13 日，是李太和同志值班，我吃了饭到值班室聊天。他告诉我，徐业夫来电话了（徐是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的一些活动多由他来安排，包括召集一些会议），叫少奇同志到大会堂 118 去一趟（118 是一个房间，主席当时就在这里吃住、办公）。他说咱俩跟首长一块儿去，一会儿就走。待了一会儿徐业夫又来电话说：“我开车去，不用你们任何人来。”不多时，徐业夫开了一辆米黄色的华沙车来接少奇同志。处在当时情况下，坐这种车是比较安全的，因为送机要的，送文件的，办具体事儿的都是开这种普通的华沙车。而平时常委一出中南海就是大吉斯车，比较引人注目。很快少奇同志就过去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回来，我们注意到少奇同志脸上有了些笑容。

第二天，光美同志把李智敏（机要秘书）叫到办公室，说昨天晚上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了，大概意思是我们党历届领导人犯错误的不少，但是改正错误的没有一个典范，希望你在改正路线错误上起到一个模范作用。主席还说让少奇同志多看书学习，保重身体。光美同志叫李智敏找几本书，说是主席叫少奇同志看的。其中有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器人》，还有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一天我值班，我们聊天就聊出这个事来了。当时会议室又是书房，他说咱俩一块儿找找。我说你在这恐怕找不到，咱这没这个书。因为会议室的书都是公开的书，光美同志下去搞“四清”之后，我们晚上值班，常看，所以我都有印象，他提的这几本书没见过。我说大书房里肯定没有，咱们在小书房找找。少奇同志办公室有一个内部书房，这里都是不公开的书。结果在小书房找了半天也没有。李智敏说这怎么办？我说有办法，咱们到北京图书馆借去，北京图书馆肯定有。可是，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随时可能闯进来批斗、贴标语，哪还有什么正常的读书时间？

在我们这些卫士看来，少奇同志和主席在工作关系上很密切。他就交代过，要是主席那儿叫开会，不管什么时间，也不管他是不是睡觉，吃没吃安眠药，都要马上叫他。而且到主席那去，什么也不讲究，穿什么都可以。如果是正睡着觉，起来后头晕忽忽的也是二话不说，马上就走，特别坚决，好像晚到一点就是对主席的不尊重。少奇同志对主席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崇敬和朴素的感情。但平时，他和主席在生活上没有什么个人来往。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起来，看到社会上的混乱局面特别是一大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少奇同志是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尽管他从心底里对有些问题也想不通，但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地把所谓的“路线错误”揽到自己身上。就在这次主席难得的接见中，他再次表明，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自己，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希望能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他甚至请求辞去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回自己的老家湖南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但这并没得到主席的回应，仅仅成为一种善良而又有些天真的愿望而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少奇同志的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也最终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 ◇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

这一时期，中南海内怀仁堂一带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不管是墙上，还是树上，花花绿绿贴的全是大字报。曾经无比神圣的殿堂失去了它应有的庄严。不过这时还内外有别，都是中南海内部人员写的。这时候社会上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战斗队，中南海里也不寂寞，相继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每一天的清晨醒来，你似乎都会有新的发现。因为社会上流行的是造反有理！一天马尚志（警卫处副处长兼二组卫士长）对我们说：外面的运动轰轰烈烈，你们这里却冷冷清清，你们也要成立战斗队嘛。于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也行动起来了。在当时的背景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运动势头，想置身其外，也是很难的。我们成立的战斗队开始是叫“卫东革命造反队”，即保卫毛泽东造反队。第二天我们贴出海报去，一看不行，因为这名字已经有人用过了，不能跟人家重了，后来又改成“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因为我们住的是在南海这边（实际上是在中海），以示和他们区别开来。在成立时有的同志选我当队长，我拒绝了。因为在此之前，中南海警卫局在1966年的7月就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筹委会”，我是筹委会的成员之一。这个组织后来群众都反对它，说它保守，不能领导文化革命。后来选的是机要秘书李智敏。这样，“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就算成立了，这是在第二次批斗少奇同志以后。

1967年3月16日，中央文革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自首叛变材料》，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中共中央批准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批示中提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

背着毛主席干的”。林彪、江青一伙乘机也大放厥词：“在党内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从而制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牵连了党内外一大批同志。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北京各大报纸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其后，又在各广播电台反复广播。这篇来势汹汹的文章以“中国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少奇同志的代名词，捏造事实，对少奇同志进行肆无忌惮的诬陷攻击，谩骂少奇同志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文中还恶狠狠地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在文章的末尾还有质问少奇同志的八个“为什么”。

在对少奇同志的攻击、陷害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造反派就想，别人都能斗，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斗？于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司机、警卫员、秘书、炊事员，十几个人也准备行动起来。大家商量说叫批斗会不好，咱们开支部大会，提问题叫他答复。这是我们开的唯一的一次，实际上是批斗会。

那天，我们拿着登有戚本禹文章的那期《红旗》杂志，来到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光美同志也在。其中一位同志说，“我们是来请你答复问题的。”少奇同志温和地说：“可以答复你们的问题，也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但要同志式的，不要把我当成敌人。”

多少次造反派来批斗，从来都是横眉怒目、恶语相加，容不得少奇同志有任何辩解，更别说提出什么要求了。而今天少奇同志对我们身边工作人员的这点希望，恰恰表明了他对那种蛮横霸道、无理取闹的批斗形式的强烈不满。有人首先叫他答复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问题，特别问到其中“61个叛徒”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话音刚落，少奇同志就气愤地站起来说：“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是污蔑！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我说过它是卖国主义的？如果这是事实，戚本禹为什么不来和我辩论？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发言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说到“61个叛徒”的问题，少奇同志也讲得很清楚，那是1931年前后，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干部，由于国民党的搜捕和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一直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1936年，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主持工作，了解到这些同志被捕前工作都很出色，被捕后在监狱里表现得也很勇敢，而他们的刑期大多已坐满，但要履行个手续才能被释放。考虑到当时日本人如果占领了北平，有可能把这些同志杀掉，所以要设法营救他们，于是把这个情况写信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很快答复，批准营救。这就是戚本禹在文中所指的少奇同志“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的“罪行”之一。生活会后，少奇同志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书面答复，拿给我们看。在事关自己政治人格问题上，少奇同志表现了异乎寻常的较真，毫不退让，而且万般愤慨，溢于言表，这是我们以前所少见的。少奇同志也已逐渐看出江青、林彪一伙的叵测的居心，所以在书面回答我们提出的“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对一段时期来对他“路线错误”的上纲上线也不再一味地接受，并流露出不满：“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活会上，我们大家还对少奇、光美同志“一·六事件”的草率做法和指导思想提出了批评。并提出少奇同志为什么不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量出版毛泽东选集，而大量出版“修养”？致使文化革命初期买“毛选”很困难。少奇同志说：“那都是康生搞的！”我记得曾多年跟随少奇同志的厨师郝苗同志说：“我们辛辛苦苦多年为你服务，一心希望你紧跟毛主席，为人民多办事，结果你犯了大错误。”光美同志自我检

查说：“同志们确实为我们辛辛苦苦、兢兢业业，我们辜负了同志们的希望，但我们有决心改正。”后来我们这次生活会也即批斗的情况简报通过汪东兴送到毛主席那儿，汪东兴又把主席的意见反馈回来，原话是这样：请转告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政治上划清界限，要背靠背地批，不要面对面地批。打这以后，我们再没开过这种会。

#### ◇ 抄家

要说以前的批斗还只算是前奏，那么第三次批斗就是高潮了，发生在1967年7月18日，这时候已是炎炎夏日。这次明里批斗，暗里是抄家。

7月18日早晨，我们去食堂吃饭时，看到了中南海造反派贴出的海报，要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地点在西大灶。西大灶是中南海工作人员的一个食堂。当时一个东大灶（在海的东岸），一个西大灶（在海的西岸）。西大灶离福祿居很近，我们吃饭都到西大灶。

这天上午，警卫局办公室主任武建华通知我们：今天晚上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你们出一人发言，批判王光美。并要我们立即赶写批判发言稿。临近晚饭时，秘书局、电话39局的十几个人进到卫士值班室，叫我们一同去少奇同志办公室。进了办公室他们向少奇、光美同志宣布：今晚开批斗会，你们去参加。李太和同志和刘秘书值班，我跟少奇同志去西大灶参加批斗会（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常委，不管位置排在第几位，在中南海里活动，就可以跟着一个卫士，只要一出中南海就是两个卫士），李智敏、于云德同志跟光美同志去西楼大厅接受批斗。临走前造反派中的一个人向光美同志要办公桌上的钥匙。光美同志说：有机要室的同志才能交出钥匙。于是她把少奇同志办公桌上的钥匙交给了机要室的人。

西大灶的斗争会由武建华主持。下午6点钟左右，当我随着少奇同志走进会场时（当然还有其他人押着我俩走进会场），屋里已经坐满了人，大约有四百人左右，都是中南海警卫局、秘书局、39局的。这次大会上批斗得相当残酷。

我把少奇同志送到会场前面，他站在那里接受批斗，就叫我站到他一侧了。进入会场时，他们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口号。批斗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不时有人叫少奇同志低头，还有人叫他弯腰坐“喷气式”，但他没有弯腰，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听他们发言。正值酷暑热夏，虽已是傍晚，西斜的阳光仍强劲地直射在西墙通体的大玻璃窗上，而少奇同志就站在西大灶的西墙窗下，面朝东正对着造反的人群。不多时，少奇同志出了很多汗，半袖的确良的衬衣都湿透了，汗滴答滴答地往下淌。我就在他旁边，这时我给他递了一块手绢，说：“你擦擦汗。”他都不敢接。我说：“没事儿，你擦一擦。”少奇同志拿起手帕刚要擦头上的汗，有人喊起来：“刘少奇把手放下来”，后来不知是谁冲上来，“啪”地把脑袋一按，这一按少奇同志就再也直不起腰来了，只好低头在那听着。这次批斗会斗了1小时40分钟，最后在一阵“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中散了会。这时的批斗说实话还批不出什么名堂来，因为尽管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分成了两派，但从思想上还不是太明确，无非还是颠来倒去的那几个问题，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啦，走资本主义道路啦等等，再有就是围攻起哄，而且这次动用了武力。我记得批完以后，汪东兴的司机李和还说，这要在外面早就把他们推下台来了，这根本不行。意思是气氛不够。我搀着疲惫不堪的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已是晚上8点钟了。一进办公室、卧室，我们都大吃一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满地的衣服、报纸乱扔着。听李太和同志说，秘书局的人来“清理文件”，以此为借口实际上是抄家，他们把所有的房间和箱子、柜子以及光美同志的衣服皮箱都打开翻了一遍。走时还把工业券和钱扔得满地都是。太和说：“我又一点点地收拾起来，简直不像话，对我们也怒目相待。”一问刘秘书，他的办公室也给抄了，所有的保险柜、机密文件全都给弄散了。安排少奇同志睡了觉，我回到宿舍一看，我们的房间也没幸免，一些照片及私人物品不见了踪影。这一次造反派采取了阴阳两套的做法，明里是批斗，暗地里抄了

国家主席的家。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康生、陈伯达乘毛泽东、周恩来不在北京之机直接决定的，事前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部署。

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在他的宿舍门口，从此站上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哨兵，开始日夜监视。光美同志被批斗回来，就再也没有叫她回原来的宿舍，而是住到本来是外婆和孩子们住的后院的一间屋里，并由39局和警卫局服务科的女同志“监护”起来。从此，少奇同志、光美同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分别软禁在中南海“福禄居”的前后院里，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连子女也不准见面。这是林彪、江青一伙给少奇同志精神上最残酷的打击。之后少奇同志曾多次问过我们，光美同志在哪里？我对他说：就在后院里。我们经常看到少奇同志在他的办公室或卧室的北窗户处，向后院里张望。从他焦虑的目光，不安的神情，我感觉得出少奇同志是在担心着光美的安危——一段时期来，她不仅与自己一同遭受批斗，遭受谩骂，还多次被强行带走，在大庭广众之中受辱。在这种恶劣的政治气候下，他担心自己的妻子有一天会一去不回。因此，他想证实自己的妻子是不是真的还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他希望能看到她，哪怕是一个背影也好。但令他万分失望的是，在专案组的严密监视下，他什么也看不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停发了少奇同志的《参考消息》和部份地方报纸。保健药品被停止了，安眠药品也从此由医务人员控制使用。长期以来，少奇同志需服用大量安眠药才能入睡，突然把药降了下来，给他睡眠造成很大困难。被软禁后的少奇同志走到哪里，武装哨兵就跟到哪里。吃饭时跟到餐厅，睡觉时哨兵站在卧室门口，就是上厕所也要跟到卫生间，总之寸步不离。连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受到哨兵的监视，所以一般情况下，除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外，很少去接近少奇同志。有时哨兵按电铃，叫我们去处理他们处理不了的事情。他们对少奇同志实行了法西斯式的专政。

#### ◇ “揪刘火线”与八·五批斗

1967年6月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以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为首的各大专院校战斗队陆续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设立了“揪刘前线总指挥部”，各院校在府右街搭起帐篷、小木屋等临时建筑。外地来北京串联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临建小屋的四周贴满传播各地批斗成果及新动向的大小字报，满街都是丑化刘少奇、王光美的画像、标语，他们还用高音喇叭冲着中南海日夜呼喊，形成喧闹一时的所谓“揪刘火线”。

“新八一战斗团”写给少奇同志一个勒令信，要少奇同志去建工学院检查。少奇同志见到勒令信非常气愤，他搬出书架上的《宪法》大声地质问，“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为什么向我勒令？”对这些置最基本的法律于不顾的恶劣行径表示了压抑已久的愤慨。

1967年的8月5日，为纪念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问世一周年，号称100万红卫兵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批斗刘邓陶大会。这次批斗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挥的有组织行动。8月5日这天，按照造反派的意思要把刘邓陶揪出中南海批斗，最后实际上是在中南海内批斗的。天安门是主会场，刘、邓两家各设了一个分会场，高音喇叭线分别和天安门的连着。

8月5日下午两点半后，中南海造反派来了几个人，从办公室里把少奇同志叫出来，押着他出门，进了西院的大门。西院里大约有三百多人。

这次批斗从下午三点多钟开始，批了两个多钟头。光美同志同时在西院里挨斗。“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和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等人坐镇指挥，批斗大会比“7·18”那次更厉害了。

少奇同志被押进会场时，途中人们拥挤不堪，不断地呼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还有的人把拳头伸到少奇同志面前喊口号。随着就是光美同志被押进会场。少奇同志站的靠北面，光美同志靠南面，都是面向群众。把他俩押进会场后，王道明在我们卫士值班室给主会场打了

一次电话，开始主持开会。他讲了几句话之后，就是造反派的代表批判发言。除了进会场的场面以外，会议开得比较“文明”，有解放军，有中南海警卫团的维持秩序。批斗会进行了一段时间，“中央文革”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气氛不够，突然宣布休会。有人押着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分别进屋“休息”，少奇同志被押到他的书房里，他要了一杯开水喝，光美同志被押在卫士值班室的外屋里。王道明对会场进行了整顿和动员。不一会儿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又被押进会场，发言的人说了没有几句，会场就乱起来了。原来坐在前面的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拥挤到前面，对着少奇、光美同志就是拳打脚踢，有的按着他俩的脑袋，叫他俩低头，有的乾脆揪住少奇同志的头发，按住少奇同志的腰，又把胳膊反背到后面，叫坐“喷气式”。这时，不知是谁把大字报撕下来，中间弄了一个洞套到了少奇同志的脖子上。摄影机的镜头对准这个场面哗哗地拍。摄影机越响，围斗的人就越是闹得厉害，这个一拳，那个一脚，劈头盖脸打在少奇和光美同志的身上。少奇同志的鞋被踢到一边去了，只好赤着脚在那里挨斗。在一片混乱中，警卫人员也没办法了，我记得是来了十几个解放军，把他两个和围斗的群众隔开了。这时少奇同志已是筋疲力尽，身上半袖的确良汗衫早已湿透了。也在这个时候，光美同志和少奇同志站到了一起。面对失去人性、仍在咆哮的造反派，只见光美同志紧紧地抓住少奇同志的手，俩人紧紧地依靠在一起。他们在传递着彼此间的牵挂与安慰，同时更传递着一种鼓励与信念：面对凌辱，绝不退缩！直到造反派又冲上来，生生地把他们分开！散会后，我在值班室门口搀着少奇同志回办公室，走路时，他每抬一下腿都很吃力。进办公室后，他坐在靠西墙的单人沙发上，一只手托着脸，满脑袋的头发被揪得直直地冲着天空。我正要给他倒杯水，这时摄影机在办公室门口对着他，又是哗哗一阵响声，意思就是要拍那个“狼狈”劲儿。忙活了一阵儿之后，这些人才撤走。这次批斗之后一直到少奇同志被迫害致死，就再也没有和家里的亲人见过面。

#### ◇ 一双袜子

八·五批斗会上，分离多日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匆匆一面，一起承受了造反派惨无人道的凌辱与迫害，却连彼此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之后又被分开单独关押，而且看管得更加严格。这次把光美同志由上次的后院转移到了最北面一直闲着的大后院里，并在前院、后院与这个院中间用沙杆、席子从东到西搭起了一道墙，本来是很长的一个院子，被截成两半儿。警卫局的人命令我，不准叫刘少奇知道后边住的是王光美。如果他要问为什么搭墙？就应付他说是为了贴大字报。这时上面已经写了好多标语：“打倒刘少奇！”“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等等。有的还在名字上打叉，或者把名字倒写。

但是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的感情是非常深的。这次分居以后，两人虽互相惦念却难通信息。还是光美同志出狱后，对我说她在大后院里被困了两个月之后就被捕入狱了，从此与世隔绝达10年之久。

我记得当时专案组负责看管的人通过中南海服务科的小严，找我说王光美要衣服。我问：“都要什么衣服？”回答是：“要夏天的衣服。”我便到卧室里去找衣服，实际上少奇同志都给她准备好了。从当时批斗的残酷性和现实处境来看，我想这一分开，何时能够团聚真的很难预料了。因为少奇同志的衣服都由我们来掌管，我就想，把少奇同志的什么东西送点给她作纪念。

我翻腾翻腾衣柜，忽然想到少奇同志有双尼龙袜子。那时尼龙袜子还很少，算得上是稀罕物，显得非常珍贵。于是我就把这双灰色的尼龙袜子连同衣服都给她拿过去了。拿过去以后，光美同志不认，又叫看守她的人找我，说给她的衣服不对，后来我就过去了。她指着袜子说：“这个不是我的。”我态度很严肃地说：“怎么不是你的！这是出国的时候给你买的，你忘了？！”这时光美同志似乎醒过味来了。这次，我还把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两人的牙缸对换了一下，他们俩的牙缸都是白色的，少奇同志的牙缸底下有一圈蓝瓷，光美同志的是全白的。之所以这么做，从我个人的角度，也是想尽量让同陷于孤独与迫害中的光美同志能多一些可能的温暖。关

于这双袜子，79年底80年初说起此事时，光美同志仍记忆深刻：“这双袜子我在监狱里一直穿着它，就是你给我拿来的，还记得吗？”我说：“怎么不记得？”“我开始没理解你的意思，你第二次来对我狠狠批评的时候，我才想明白了。你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当时我考虑只能给你双袜子，别的你都不能要。衣服，他的大，你不能穿，颜色也不一样。当时首长能拿到你的东西，因为你的东西都在家里。你得到他的东西却很困难，所以只能给你双袜子（作为纪念）。”她说后来理解了这件事儿。这双袜子陪伴光美同志度过了十年黑暗的监狱生活。现在保存在少奇同志纪念馆（湖南长沙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已成为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 ◇ 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

除上面提到的几次大的批斗会以外，各种小型的斗争会更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八·五批斗以后，有一次我记得也是中南海的造反派大约四五个人闯到他的办公室来造反。那时办公室里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传单不允许给他看，《参考消息》也不给了，他惟独能知道的信息就是《人民日报》和《北京晚报》，再就是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少奇同志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小书架，书架上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看造反派又来批斗，少奇同志就举起《宪法》，高声抗议：“《宪法》是我作的报告，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到法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我个人无所谓，我们国家的尊严不可践踏！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面对造反派肆无忌惮的说批就批，说斗就斗，少奇同志早已义愤填膺。他要用《宪法》来捍卫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曾多次向造反派发出这样的呐喊，做这种正义的抗争！可是有谁听啊！中南海有一个保健组，专门给常委们打针吃药。一次少奇同志病了，我们马上给中南海保健组打电话。而这些人来了以后，不是赶紧看病诊断，而是先背毛主席语录，什么要斗私批修，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特别是一位姓张的大夫，一是难请，再有来了以后就是批斗，背语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诸如此类。斗了以后，才给听听心脏，量量体温，最后也只是给些一般的药，应付应付了事。等后来得了大病，发高烧40多度了，综合性肺炎，这才下决心抢救。

#### ◇ 被监禁的日日夜夜

从八·五批斗与光美同志再次隔离开以后，少奇同志的生活就全仗他自己了。以前在一块儿的时候，光美同志从各方面照顾他。工作上的配合默契自不必说，生活上特别是精神上的关怀与安慰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而这种强行的分离对晚年的少奇同志是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他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完全垮了下来。

林彪、江青一伙不仅从精神上残酷地折磨少奇同志，从生活上也是百般摧残。早在1967年6月的一个夜晚，为少奇同志当了16年的厨师郝苗同志被抓走了。郝苗同志从1951年以来一直是少奇同志的得力厨师，他对少奇同志的生活习惯、饮食口味了如指掌。少奇同志的晚年身体强壮起来与郝苗同志有着直接的关系。逮捕郝苗以后，只剩一个白案炊事员冯师傅，当时看他做菜也不行，随后也因某种原因调走了。最后只剩李太和、于云德、李智敏和我四个人，其他人全都走了。之所以把我们留到这里，就是要照顾他的生活。因为熟悉一个人特别是中央首长的生活习惯，是不容易的。他和邓家不一样，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始终没有分开，卫士撤了也没事，生活上还有人照顾。刘家就不行了，他们已把光美同志逮起来了，不久送进了秦城监狱。我们三个卫士留下后就轮流值班。每天搞搞卫生，给烧点开水，拿拿烟。没厨师做饭了，怎么办？请示汪东兴，答复是叫我们工作人员吃饭的时候从大食堂给他往回打。饭菜常常买回来就凉了，只好再热热给少奇同志吃。他一个牙都没有了，满口假牙，能吃下去吗？！为了照顾他的胃口，我们尽量地买软菜，如丸子、豆腐之类的。开始是给他买好菜，两角钱以上的菜，最好的也不过三角钱而已。时间长了，人们知道我们是给少奇同志买的饭菜，尤其是中南海造反派的头头就训斥我们：给他吃点儿就行了，为什么还给他吃好菜？！也有的指着我

们的脊梁骨骂我们是“保皇派”，“黑司令的走狗！”由于饮食质量大幅度的下降，再加上精神上的长期折磨以及来自报纸、广播等各方面的刺激，少奇同志郁愤成疾，他的身体逐渐垮下来了。1968年3月以后少奇同志吃饭、走路都很困难了。后来吃饭由卧室到餐厅，也就20几米远，要走半小时到40分钟的时间，一条腿已经是拖着抬不起来了。就是这样，仍然是全副武装的哨兵，背着卡宾枪，像看犯人一样跟着，走一步跟一步，寸步不离。我们卫士也只能后面跟着，不许搀扶。吃饭时，手和嘴也配合不到一起了：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就是这样，哨兵仍然盯得死死的。本来我们话就不多，这时就一句话也不敢说了。扶扶他、搀搀他都不行。不是不行，是不让，说你划不清界限。这时候，看着少奇同志蹒跚的脚步，和因身体日渐衰弱而有些佝偻的身躯，我的心里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甚至幻觉：这还是我心目中整日里为国事操劳、无限敬仰的刘主席吗？这还是一贯生活简朴、常常朴素得像自己的父辈的那位长者吗？他曾是主席非常信赖的战友、同志、接班人，为什么一夜之间好像一切都翻了个个？我真的有些想不明白，百思不得其解。这些问题、这种痛苦的感受很长时间内困扰着我，冲击着我，使我夜不安枕，惆怅万分。但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从生活上照料他，帮助他。不久我们就不叫他去餐厅吃饭了，在光美同志办公室放了一个小桌，后来乾脆又把桌子搬到卧室。吃一顿饭要很长时间，而且弄得满桌子、满身上是菜。我们将这些情况书面报告警卫局。后来答复：可以叫干部队的人给他做饭。干部队开始派了一个分队长张炳尔（过去做过饭，当过炊事班长）给少奇同志做饭。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叫他做了，又换了个也当过炊事员的战士，也做了不长时间。少奇同志的饮食实在是太差劲了，每餐吃不了多少东西。有一次在卧室吃完饭，我们去收拾碗筷，发现少奇同志的裤子湿了一大片，后来又多次发现此事，我们知道他的小便失去了控制能力。多次发现他的病情后给中南海门诊部打电话叫大夫来，每次都不那么痛快，有时要打几次电话才来，来了之后首先是向少奇同志训斥一番，而后给点药应付一下了事。1968年6月初的一次，少奇同志对护士小马说：“你们给我看病是假的，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少奇同志曾得过肺结核病，有严重的糖尿病，这时就连治糖尿病最基本的药D860也不给吃了。

我们再次将少奇同志的病情及生活情况写成文字上报。答复是：生活上不下降，以前吃什么现在还吃什么。中南海的供应站早在1967年12月就造反不供应他了，经过请示叫我们从市场上买东西，市场上有什么就给他吃什么。于是我们一方面从市场上买些蔬菜、水果，另一方面把过去剩下的燕窝、海参、发菜等统统拿出来给他吃。可是当时战士做饭，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那里会做呢？供应站既不供东西，后来又没了厨师做饭，生活上不下降不是一句空话吗？

这时候少奇同志大小便都失禁了。原来中南海有洗衣房，洗衣房工人也造反不给刘少奇洗衣服。怎么办呢？我们几个商量后决定拿到外边洗衣店去洗，因为他还有工资。以后不管拉的尿的，大件的衣服、被褥都拿单子一包，送到西安门的洗衣店去洗。小件的如短裤、汗衫等仍由我们来洗。

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该洗澡时帮着给他洗澡，但到了后期他身子动不了了。那时刘秘书还没走，一次值班时，我心情沉痛地跟他说，首长已经骨瘦如柴了，体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真是让人不忍心看。想想少奇同志为党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到这种地步，后事都不敢想象。谁能预料到将来会怎么样？我俩小声地在值班室谈了很长时间，既为少奇同志的不幸感到忧虑，也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但又不敢怎样，因为哨兵就在门口外边。那时候可以说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了。

#### ◇ 生重病

经过长期精神上的折磨和身体上的摧残，终于在1968年6月下旬，少奇同志患了急性



肺炎，发高烧。我们一方面书面告急，另一方面找警卫局领导。开始并没有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治疗也只是一般地给些药物应付一下。几天后他的高烧不退，在病危的关键时刻，由杨德中同志（警卫团政委）亲自组织中西医专家进行抢救。当时干部大队李广仁队长协助杨德中同志做具体工作。我记得参加抢救少奇同志的有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医院以及空军总医院的专家，除了解放军总医院的两个护士进行护理外，杨德中同志还特意从玉泉山把曾经护理过胡志明同志的卫生员调来参加护理。专家们曾提出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的建议，但没有得到批准。高烧曾反复过几次，在少奇同志病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参加会诊治疗的专家被陆续叫回原单位。由于有限度的治疗，少奇同志的病情并未得到真正的好转。这次得病后少奇同志基本上就瘫痪不能走了，一直卧床到死。这次组织会诊抢救，报告了主席，主席有了批示：政治上划清界限，生活标准不降低。解放军总医院的两名护士只呆了两个月，8月初，由于某种原因调回总院，来接替她俩的是北京医院的曹兵、纪秀云同志。这两个同志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比总院的要好，工作也比较安心。两个人一直护理到开完九大，1969年10月林彪“第一号令”之后，把少奇同志转移到开封，她们才撤出来。这俩人不仅护理水平高，而且处理问题果断，小的地方该用什么药，不经过医生就及时用上了。我们在旁边看着，定时给翻身，做按摩，舒筋活血，用酒精消毒，所以少奇同志在北京期间没有得褥疮，护理得很好。一个多月后，少奇同志的嘴张不开了，因此流食也就不能从口而入。只好从鼻孔插橡皮导管，用注射器将混合奶（牛奶、高蛋白、麦乳精、可可等混合而成）注入体内，直到少奇同志逝世，都是用这种方法维持生命。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由江青、康生等人一手操纵、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我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思想压力更大了，来自外界的讽刺、歧视更多了。警卫局某些领导对我们也另眼相待，不少政治生活中应该享受的待遇也被剥夺了。

从卧床不起之后，少奇同志再没讲过一句话。我在这中间病了一段时间，住了一段医院。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又参加值班，突然有一天，曹兵跟我说：“小贾，刘少奇找你呢。”我以为是在开玩笑。“真的找你，点名找小贾，你去吧。”我就进去了。哨兵就在门口，他得记录哇。少奇同志在床上躺着，已不能动了，我走到他床前问他：“有事吗？”他没有反应，只是瞪大了眼睛，我大声地又问了声：“有事吗？”少奇同志微笑了一下，在床上躺着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我说：“有事你就说，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他又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讲。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少奇同志，久经折磨，身体已经非常瘦弱，原来左耳下的小瘤子也显得很凸出了。此时少奇同志难得的微笑却让人感觉是那样的辛酸和悲凉。这一情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印象仍特别深刻。这也是惟一的一次，自从和光美同志分离之后，任何人没有找过。就这样一个事情哨兵也做了记录。由于受病的折磨，少奇同志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是伸开手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由于实在不忍心看他这种痛苦的样子，我们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拿给他，让他捏在手里。到后来，这两个塑料瓶完全变了形，被攥成了两个小葫芦！到了后期，少奇同志不再讲话，即使在遭受病痛折磨时，也是默默忍受。他是用沉默来表达自己心底的抗争。后来我想，这次找我来，也许就是想看看这个时候还有没有自己身边的人。要知道，身心俱疲的少奇同志已见不到一个亲人：自己的妻子身在何方？钟爱的儿女又在哪里？都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承受这种孤独与凄凉又需要怎样的毅力呢？

#### ◇ 转移开封

1969年10月17日晚上，汪东兴来了，把我们几个人召集到一块儿，在西会议室给我们传达：“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后来才知道所谓休息是根据林彪的一号通令，把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到外地），到开封。”并说要告诉刘少奇。李太和到卧

室就对少奇同志说了，但怕他领会不了，小于就用棉签蘸上墨水，在一张长条纸上写上：“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外地去休息。”写好后拿到少奇同志眼前，少奇同志扭头不看。

之后开始分工，卫士组叫李太和一个人去，另外有高生堂（汪的秘书）和当时护理少奇同志的两位护士去，乘第二天晚上的飞机。叫我在家移交东西，于云德和李智敏去五七干校。

10月17日晚上，他们用担架把少奇同志抬到一辆救护车上，匆忙间，只给少奇同志穿了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就裹了床被子。然后送到北京昌平机场，送上飞机。当晚，飞机从昌平机场起飞，夜航到了开封。

这时我开始在家里搞移交，哪怕是一本书，一件衣服，都要一一登记造册，同时有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两个同志协助。穿梭在自己曾经那样熟悉的环境中，如今已是物是人非。抚摸着书架上蒙尘的书籍，我的思绪万千。翻开上面醒目摆放的《毛泽东选集》，随处可见有少奇同志阅读时圈圈点点的笔迹，而少奇同志多次高举的表示向造反派抗争的《中华人发共和国宪法》，仍静静地躺在那里，少奇同志的办公桌前，只见宽大的桌面上散落着几张破旧的报纸，几支已经多时不用的铅笔孤零零地立在笔筒里，而从前在少奇同志超负荷工作时，它们可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伙伴。整理少奇同志的衣物，更是让我心潮难平。出国时才定做的不多的几件衣服和皮鞋（这还是在我们的努力争取下才同意的）依然簇新。而拿起那件灰色泛白的半袖的确良衬衣，我的心蓦地在抽紧：7月18日和8月5日的两次批斗，少奇同志都是穿着它。这上面浸透着少奇同志的汗水，也蕴含着少奇同志心底的血泪。

从书房，到办公室，再到卧室，我依次地、仔细地翻检，登记。多少次，作为工作职责，我们曾清理、打扫这些地方，那时都是一种轻快的心情。而今天，当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细致、更全面地接近少奇同志工作、生活过的每一处地方时，我的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沉重甚至是煎熬。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终于整理完毕。我签过字，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人也签了字，算是移交清楚。环视一遍已变得空旷、寂寥的福祿居，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算是做最后的道别。然后慢慢地关上两扇大门，上好锁，把钥匙交给了干部大队看管起来。他们通知我（那时不叫通知，是勒令）24小时离开中南海。我说不用24小时，两个小时我就走。我的行李也很简单，一个小破木箱子（现在还留着呢），一个铺盖卷儿。在凛冽的寒风中，我背起行囊上路了。从这一刻起，我离开了工作、生活了近10年的中南海，离开了留下自己欢欣与痛楚的福祿居。中央警卫局在西安门有一个招待所，我被指令到那里等待处理，这是1969年的12月份。一天，我见到了准备去上五七干校的李太和。一见面，太和对我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一听到这话，我的脑子里突然一片茫然，好像空气一下子都冷凝起来，半天才缓过神来。我明白，少奇同志已经走了。太和接着告诉我，当时火化时写的申请人是刘源，与死者的关系是父子。死者姓名写的刘卫黄，职业是无业。我忙问“骨灰怎么办了？”“就放在开封火葬场。”我说：“这事你可记清楚了，因为你是经手的。”他说还有专案组的人。太和还告诉我，当时死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因为没有鞋，他就给买了一双，身上穿的还是布做的制服。从1969年10月17日晚从北京转移到开封，到11月12日6时45分，仅仅26天，少奇同志带着病痛、带着悲愤离开了人世，就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形同监狱的小天井院里。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哪怕是自己熟悉的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国家主席在告别人世时竟变成了“无业”！而在少奇同志含冤辞世的多年里，家人根本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而中国广大的老百姓，更是对少奇之死毫无所知。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啊。1970年1月26日，我被发配到保定胶片厂，离开了仍处在狂热、混乱中的首都北京。

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30周年的日子里，打开记忆的闸门，缅怀他的不平凡的人生，带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思念。重述这些饱含血泪的往事，也带给我们对那段黑暗历史的深深反思。但愿少奇同志和许许多多的普通百姓付出的生命代价，能使今后不再有这种悲剧的历史重演。在

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站在新世纪的门口，我们不能也不应忘记一位共和国的领袖，他曾经历的悲欢荣辱及所承载的历史重负。而我们告慰少奇同志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民主富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我想，这也是少奇同志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理想。少奇同志不朽！

（此文写作，得到了臧惠杰同志的帮助，特此致谢！）（全文完）

□ 原载《百年潮》2000年第1—第2期

~~~~~

# 【学术争鸣】

## 为刘少奇一辩——与王湘先生商榷

• 徐明旭 •

《北京之春》九六年七月号上王湘先生的文章“刘少奇扮演的角色”（见本刊zk9610a——编者）指斥刘少奇在文革初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了许多无辜人民，因而对刘作了否定的评价。我在文革初深受资反路线迫害，对刘自然没有好感。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愚以为刘少奇仍有值得肯定之处。

如所周知，刘少奇与林彪一样是靠捧毛起家的。他在中共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名目，并将“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七大党章，从而得到毛的青睐，跃升为位居周恩来之上的第二号人物，并被指定为毛的继承人。

刘得志后，便欲取而代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后，刘亦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批判中共党内的“个人崇拜”（却不提对毛的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锋芒直逼毛，又指使邓小平在八大党章中删去“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从而使毛怀恨在心，为自己埋下祸根。

诚然，刘对毛前恭后倨是为了争权夺利，与老百姓的利益无甚关系。但刘的某些自由化主张与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

早在中共执政之初，刘便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财产”、“联合资产阶级”、“长期保护富农经济”、“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宁右勿左”、“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等等，与毛恨不得一夜之间消灭所有资本家、富农（那时地主已被打倒），马上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的左倾政策恰成对照（所以毛在文革初说刘是老反革命）。假如当时中共按刘的主张行事，邓小平也无须在三十年后补资本主义的课。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期，毛无颜见人，以退为进，让刘收拾残局。刘仿效赫鲁晓夫的改革，推行自由化政策。在农村提出著名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与包产到户）。这在毛眼里是反对集体化、复辟资本主义。

在企业界刘提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一长制等；而毛一贯欣赏“鞍钢宪法”，即政治挂帅、只算政治帐，工人参与管理、党委领导等。

在教育界刘主张教授治校、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重点培养尖子等；

而毛则强调党委领导、突出政治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阶级路线即出身歧视、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教授）等。

在文艺界刘受赫鲁晓夫“解冻”政策影响，允许有限度的暴露阴暗面，鼓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主张文艺可以不描写革命与阶级斗争等，催生了一批类似苏联“解冻文学”的作品，如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青春之歌》（后被江青指斥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与小资产阶级情调）与《不夜城》、《林家铺子》（后被江青指斥为美化资本家、宣扬阶级调和、合作论），邓拓的杂文《燕山夜话》，吴晗的戏剧《海瑞罢官》、田汉的戏剧《谢瑶环》、孟超的戏剧《李慧娘》等（都被毛江指斥为借古讽今、暴露阴暗面），同时也使毛所谓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充斥中国舞台、银幕。毛的文艺政策则是不准暴露（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只准歌颂，而且要塑造不食人间烟火的没有七情六欲的高大全的无产阶级英雄，如江青“培育”的“革命样板戏”。

应该承认，刘的经济政策救活了许多百姓特别是农民，开了邓小平八十年代改革的先河（邓当时也是刘的合作者）。刘的教育政策培养了一批人才，刘的文艺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活跃了思想，这都是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

当然，刘少奇是个正统的共产党人，他搞这些是为了补天，不是拆天。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确实减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与痛苦，刘不失为一个清官与贤相。

毛从其中国农民式的共产乌托邦主义出发，当然容不得刘的自由化经济政策；毛从其中国农民的狭隘天性出发，更见不得刘的教育政策导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翘尾巴”（在毛眼里，所有受过现代文化科技知识教育的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从其中国农民的文化趣味出发，也见不得刘的文艺政策导致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大泛滥”（在毛眼里，所有受过一点西方文明熏染即沾点洋气的人都是小资产阶级，他们谈情说爱、交友待人及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均属资产阶级人性论）。何况刘的那些政策是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而赫氏又是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带头人，而刘则是批判毛的个人崇拜的带头人。他与刘在权力上你死我活，政见上南辕北辙，文化上格格不入，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与“炮打司令部”。

关于毛发动文革动乱，人们已说了很多，归纳起来有：权力斗争说、反官僚主义说、确保自己死后无赫式人物焚尸说。这都有理，但人们忽略了毛的文化趣味动机。记得周恩来文革初对红卫兵说过，毛发动文革就是要让全国社会的风气回到延安时代去。所谓延安风气，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事共产主义加上“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翻身道情”之类的“工农兵文艺”，即以禁欲主义为特色的军事农民文化（当然这只是规范小兵小民的，并不妨碍中共领袖们在窑洞里开舞会）。毛发动文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及时用他的心爱的军事农民文化取代他深恶痛绝的资产阶级文化。

如所周知，中国的老农最见不得青年男女在街上“拍拖”。阿Q老前辈为了发扬正气，不惜躲在暗处向街上并肩而行的“鸟男女”扔石子。记得文革初北京红卫兵冲到上海破四旧时，曾把在南京路上拍拖的男女当作资产阶级批斗，还剪他们的烫发、裙子、裤管，敲断其高跟鞋的跟，可见阿Q他老人家其实并未如小尼姑所言“断子绝孙”。同理，毛也见不得文艺作品描写男女恋爱（当然并不妨碍他自己玩女人），所以江青培育的革命样板戏里的无产阶级英雄一律没有情人或配偶，阿庆嫂的丈夫阿庆已与她分居，李玉和没有老婆却有女儿，祖孙三代似乎都是无性繁殖的。

毛在文革中通过全民军事化与“普及样板戏”一度成功地使全国回到了延安时代。那时所

有工厂、学校、商店、机关都在军宣队统治下实行军事编制，不分老幼多要整队出操，可谓团结矣；出操后便整天开会学毛著斗私批修与斗阶级敌人，可谓紧张矣；无论男女一律穿国防绿军便服，无人敢上街拍拖，可谓严肃矣；每天看听唱革命样板戏与颂毛歌舞，可谓活泼矣。

可惜好景不长，全国军事化刺激起林彪的野心，普及样板戏刺激起江青的野心，这两个暴发户在一九七零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的火并打乱阿毛的“伟大战略部署”，震落了毛头上的光环，加速了文革的破产与毛的死亡，这是毛所始料不及的。

□ 《北京之春》44期

~~~~~

# 【当事者说】

## 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

• 纪坡民 •

我父亲纪登奎于1988年7月因突患心脏病去世，已有十几年了。1989年前，我还在外地工作，只是过年过节回北京探亲。父亲下台多年了，工作不忙，空闲时间很多，父亲是个话很多的人，甚至有点太多，这也许不太适合搞政治。不过，这倒使我有机会间间断断地听他谈过不少他在政坛经历的一些往事，尤其是他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前后的情况，印象很深，至今记忆犹新。

### ◇ “九大”会上的一段往事

我父亲是在“文革”期间1969年党的“九大”会议后到中央工作的。按一般人的说法，该算是“文革新贵”了。不过他在“文革”中也经历过不少坎坷。

“文革”前，父亲只是个地方干部，在河南省委担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1966年“文革”开始时，省委安排他出任“省委文革”付组长，处在“文化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那是个受罪的差事，不分白天黑夜，每天接待川流不息的“革命群众”，还要被揪来揪去，到处作检讨。不过开始时身份还是省委领导成员，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中勉强维持着省委的起码工作秩序。

到1967年1月，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影响下，省委被“夺权”，父亲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组织”关押起来，音信完全断绝，只有在开大会被批斗的时候，家里人才知道他还活着。这一段时间，有近半年。

时常听人说到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是为了排除异己，可这个话对我父亲却不适合。“文革”时代，毛主席有句称父亲为“我的老朋友”的话，十分有名，流传很广。不过了解情况的老同志都知道，父亲比主席小整整三十岁，仅从年令看，地地道道只是个晚辈，因此所谓“我的老朋友”的来历，只是从解放初期开始，向主席单独汇报过工作，截止到文革前，听父亲说，有十三次。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这算是相当特殊的待遇了。在许多人眼里，父亲是毛主席很喜欢也很器重的干部，是主席的“红人”，可是在“文革”时，主席让领导干部在“大风大浪中游泳”，作为毛主席的“老朋友”，父亲同样呛了个半死，差点丢掉了性命。

1967年6—7月，在中央解决河南两派问题的八次汇报会后，他“解放”了，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革筹”副组长，成了“革命领导干部”。1968年春，又担任河南省革命委

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他出席了党的“九大”会议。不知这是否与毛主席又想起了他这个“老朋友”有关系。1

父亲谈起过他在“九大”会上的一件往事：他作为“九大代表”到北京后，“九大”会议主席团派人和他谈话，要他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

父亲说：“我作这个发言不合适。我不是革命干部，只能算是个解放干部。”

来说：“那你认为谁是革命干部呢？”

父亲说：“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革命干部，大概刘格平、王效禹他们（分别为山西省、山东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编者），人家那些人才应该算吧。”

来说：“你知道吗？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是毛主席让你代表革命干部作大会发言的。你应该服从。”

可是父亲还是拒绝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

来人表示很为难，说：“那我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

父亲说：“你就把我说的话向毛主席汇报。”

来人走后，很快又回来了，说：“我向毛主席汇报过了，主席说，他就是让你这个‘解放干部’作大会发言。”接着又讲了一番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道理。

“九大”的大会发言共9人。周恩来、康生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陈永贵代表农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凤英代表妇女，孙玉国代表解放军。我父亲的发言，在报导的时候，还是“革命干部代表”。在“九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的“九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我问父亲，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你发言呢？

他说：被关押批斗那一段时间，曾将我“坐飞机”一百多次，这件事毛主席听说了，大概他认为我是他希望的那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1969年6月，“九大”之后两个月，毛主席和他谈话后，把他从河南调到北京在中央工作。“文革”期间，父亲在中央的党、政、军都有职务，管过不少事情。

#### ◇ 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十年文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许多资格很老、功劳很大的开国元勋、功臣战将和大批领导干部都被打倒，靠边站了。我父亲只是个“三八式”干部，一下子当了“中央领导人”，也实在是扎眼得很。“文化革命”，毛主席错了，中央的路线错了，他自然也跟着犯了许多错误。

1980年5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父亲辞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1982年，中央安排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研。给他安排的职务，叫“部级研究员”，在中国，这大概是最高的“技术职称”了。父亲还谈到：组织上和他谈话时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同志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职务也是“研究员”。他有点调侃地说：“想不到下台以后，我和党中央的总书记成了一样的待遇，也算是很荣幸呢。”

关于辞职下台的事，我觉得父亲还算比较通达，谈起来也不怎么避讳，也许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

父亲说，他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基本已成定局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思想和政治路线发生根本改变的转折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由此开端。不过，我们后来所说的“三中全会”，实际上是前后相继的两个会议的合称，前面是“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后面接着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有几天。

就是在这次“三中全会”上，父亲因为“文革”期间在中央工作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大家对他提了很多意见，有的意见还很尖锐激烈。和父亲一起挨批评的，还有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和苏振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三中全会”之前，父亲在国务院的主要工作是主管农业，三中全会上挨批后，工作要变动。在工作交接问题上，就谁来接任他分管的事，胡耀邦同志征求他的意见。父亲先推荐赵紫阳，因赵紫阳说他在四川的工作离不开，父亲又推荐了王任重，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

父亲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同志找他谈话，又要他接任别的工作，后来父亲又管了一段时间旅游。所以，三中全会以后，他一方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一方面也还在工作，不过事情不多了。

父亲是个工作狂，他排行老三，我们孩子都管他叫“拼命三郎”。工作负荷忽然减下来，就那么一点儿事，他有点不适应。当然，挨批评自然也不是什么好受的事，他心情不太舒畅。1979年夏天，他和吴德商量，他准备向中央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请求。吴德不同意，对他说：“辞职的事，你自己不要提。”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曾对来访的匈牙利卡达尔的一个高级顾问说过中央的人事“只进不出”的意见，在党内传达了。吴德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情况吧，他说：“工作和职务的事，听中央安排吧，要顾全大局。”父亲认为吴德考虑问题比较周到，说吴德是个“超级稳健派”。父亲没有向中央提出他的辞职请求。

又过了八九个月，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时，父亲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人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中央全会批准了他们的辞职。

实际上，关于他们四人辞职的事，也是事前的中央决定。父亲辞职，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宋任穷、王鹤寿两同志受中央委派同他谈话时通知他的。

我问他：这次谈话是不是批评你了。

父亲说：没有。他们对我说：“你是很有能力的干部。文革前，我们就听毛主席表扬过你；来中央以后，我们听说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央文件都是你主持起草的。”等等，说了不少好话。最后，他们两个一提到辞职的事，我立即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同意主动辞职。

父亲说：这些事情，都是中央决定了的事，他们两位只是奉命办事。我痛快一点，他俩的差使也好办点，何必叫人家为难呢。

听了父亲谈的情况，我对他开玩笑说：“我听过一句顺口溜：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昨天垒在大会堂，今天砌在臭茅房；党叫当官就当官，党叫坐监就坐监，一切听从党召唤，谁也不准讲价钱。不过，我们党过去好像从来没有辞职这一说，你也算是首开先河了吧？”他说：“我还不是第一个，开先例的是李德生。”

李德生同志是“九大”和父亲一起提上来的，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调中央后，他们两人

工作关系很密切。后来，父亲和李德生奉主席之命到北京军区，一个当政委，一个当司令，执行的任务叫“挖墙角”，是毛主席对付林彪的“三大措施”之一。那些事情，情况很复杂，工作很困难，但他们顺利完成了主席交给的任务，两人合作相处得也很好。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有“文革”那样的大背景？后来，一点小事，便抓住不放，“四人帮”乘机胡闹，整李德生同志。那已经是“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李德生和陈锡联从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互相对调以后的事了。

可是对李德生同志辞职的事，父亲是知道的。李德生同志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是1975年党中央的“一号文”公布的。大概是1974年底吧，父亲和李先念同志两人受中央委派和李德生同志谈话，提到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大概也是我们党内从来没所谓辞职的先例吧，李德生听了以后很诧异，还在对“四人帮”整他的事生气。“文革”后期那种乱局，有许多事，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父亲和李先念只是奉命办事，不愿意和李德生同志争论、再伤害他。父亲便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李德生同志听了这个话，便不再说什么了。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之后，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十年代，李德生还担任国防大学的政委。

所以，李德生同志才是我们党内开辞职先例的第一个人。对父亲来说，向自己的“老伙计”通报辞职的要求，撂的自然不是什么好差使，依通常的人情，也许会损害他们在困难时候结下的友谊。不过，李德生同志是有风格的，父亲去世时，他还亲自来家里吊唁，而且颇为动情地谈到当年他们任职北京军区时“一起熬夜”的情形。

听了父亲这些断断续续谈到的关于“辞职”的故事，使我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联想呢？首先当然是，“文革”的狂热时代过去了，对政治问题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结束了，领导干部下台的形式也有了变化。父亲通过“辞职”下台，没有再象“文化大革命”时遭到残酷迫害的“彭、罗、陆、杨”、“杨、余、傅”等老革命们一样的命运，是他和我们的家庭之幸。

其次，象那部电视剧的片名一样——“激情燃烧的岁月”，现在也随之而去了。其实，“激情”，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遗产，对处在“现代化强行军”的中国，对于激扬民气、凝聚民族精神，原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十年文革，让它白白地“燃烧”掉了，也未免使人有点留恋惋惜。而党内生活这些过于严峻的道德准则，归根结底，也是适应这种“激情”的伴生物。象黑格尔说的那样，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现实事物，当时也会有它的合理性。

如今，我们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总理、首相、部长、大臣等政府高官，或因政见不合、或自感能力不能胜任、或因失职渎职、或因道德形像污损而“辞职”的事，几乎司空见惯。不像我们在“文革”时，非要弄成个“反党集团”或者什么“路线”才行，也不象父亲他们“辞职”时，搞得那么别别扭扭、羞羞答答、曲曲折折、费许多周章。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也需要现代化呢。

“辞职”的办法，是政治生活走向理性和成熟的标志。中国人民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政坛风云之后，对政治高层人事变动在认识上逐渐理性化了。毛主席曾有这么那两句“语录”：难道离了那一个人，地球就不转了？难道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如今，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强得多了，这两句原来只认为是开玩笑的趣话，将会作为政治生活的现实而接受它。

“辞职”之法，作为政治生活的常规，应该提倡，而且应当制度化。



## ◇ 出任军职期间的轶事

任何一个政权，其核心的权力都是军队。这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父亲谈起这个道理时，颇为感慨，他说：“文化革命”的时候，“天下大乱”，什么党中央、国务院，什么各级党委、地方政府，还有工、青、妇，全都冲垮了，实际上都不起作用了；但是，只要解放军还在，这个国家的政权就还在。“文化革命”，把这个道理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老毛把这个事情看得很彻底，他算是把国家的本质看透了。——父亲说这番话时，把他通常时时挂在嘴上的“主席”，换成了口吻颇有一些不恭味道的“老毛”。

不过，现代国家，职能分化，术业各有专攻。军队的职能主要是对外。内部安全则主要依靠警察。当然，现代国家，是法制社会，现代政府，更多地是服务功能。所以，这个道理如果反过来讲的话，其真理性则具有了一种衡量历史进步的意义：政府职能分化的程度，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标志。

这个道理，如果单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看，不论是它的正命题还是其反命题，其真理性都是无可置疑的；可若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去来看，用我们时下最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有了“与时俱进”还是“与时俱进”的分别。

我父亲虽然也是个“老八路”，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但他一直是个“文官”，是搞“地方工作”的。父亲说，他虽然也算打过仗，可那只是“剿匪”，最多也就指挥过一个团的兵力吧，还是些个“地方部队”。正规军的大兵团作战，他完全没有经验。可是，父亲在中央工作期间，却出任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统领过七八十万军队，他还是军委领导成员，起草过“八军区司令对调”的文件。显然，在我们人民解放军如云的战将里，他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战功”。父亲出任军职，完全是政治性的。

1970年12月，父亲和李德生奉毛主席之命，参加“批陈整风”的“华北会议”，去“挖墙角”；而后在北京军区出任政委和司令，为毛主席对林彪的斗争，守住北京身边这块“阵地”。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按毛主席的说法，“司令常来又常往”，李德生走了，陈锡联来了，“政委欢送又欢迎”，父亲一直留在北京军区。

父亲去“军委办事组”，更是毛主席亲自点将。主席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象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砂子。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一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父亲讲到这一段时，我问他：“你没有搞过军事，到那里面怎么工作呀？”他说：“主席是怕他们搞鬼，叫我去那里，就是看着他们。有时候我提点意见，仅仅是文件上的文字修改的事，也把他们搞得精神很紧张。”

他还说到：“军事上的事，我确实不懂。李德生比我强点，也只指挥过一个师、一个军。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北京军区是首都门户，万一有点闪失，我不仅要掉脑袋，而且还会成为民族罪人。我对这件事十分担忧，也有自知之明，急中生智，去把粟裕请来了，那是我们军队的名将了。我给他配了几名最好的作战参谋，坐个吉普车，在边境防区漫山遍野地转了几个月。粟裕搞出来一个作战方案，交军事科学院和军事学院的内行和专家们看了以后，认为确实不错，我才比较放心了。”

林彪事件后，父亲又在叶帅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工作。就这样，按父亲的话，他也“和军队的老总们在一起混了七、八年”。

在军队任职，自然会和林彪打交道。当我问父亲对林彪的印象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当地方干部的时候，对中央的事情了解得很少。这位林副统帅，在我们眼里，和你们差不多，也是象神一样。到中央工作后，先是解决各省、各部、大型企业的文革两派问题，党政方面也管过不少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参加讨论工业、农业、财贸、整党、外交等各种问题，一个国家，头绪很多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很多，各方面的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指示。可是这位副统帅，中央讨论工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农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财贸，还是没有他的意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也没有他的意见……。我很奇怪：这位副统帅，究竟在考虑什么问题呢？怎么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他的意见呢？中央的文件上，林彪的批示也总是“完全同意主席意见”几个字。我想，也许林副统帅在考虑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吧。可是，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发现还是这样：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讨论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没有这位副统帅的指示，听不到他的任何意见。这我就更奇怪了，这位副统帅，究竟在干什么呢？……”

这段话，父亲曾先后对我讲过两次，一次是七十年代，一次是八十年代，两次讲的内容和口气，基本一样。大概中央的事，我们这些当老百姓的很难明白。对父亲这段话，我一直不明白：既不明白中央的事为什么会是这样，也不明白父亲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父亲还讲过他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情况，也很有意思。1971年夏天，周总理带着黄永胜、张春桥和我父亲一起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父亲说，他向林彪汇报的问题是：“军队现在冗员太多，一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一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团、营，一直到基层，也都是一个正职，好多个副职……。”他请示林彪：“林总，您是打过仗的人，军队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有了战争，还能打仗吗？”林彪听了以后说：“就是啊，那怎么办呢？”

我问父亲：“军队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父亲说：“文化革命，三支两军嘛。军队干部，派出去一批，提拔起来一批，再派出去一批，又提拔起来一批……。三支两军结束了，军队干部都从地方上回来了，军队干部自然就多了，就搞成这个样子了。”

我问父亲：“那林彪说怎么办呢？”

父亲说：“情况他也不知道，可他也不说个办法。就这么一句，没有下文了。”

父亲说：“小平的风格，和林彪完全不同。1975年，小平抓军队整顿，对存在问题，讲了五个字：‘肿、散、骄、奢、惰’。解决办法，部队各级军政首长，一个正职，一两个副职，剩下的统统清理，成立顾问组，都塞到那里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割疮带肉，快刀斩乱麻，问题就解决了。”

我问父亲：“林彪为什么不这么搞呢？”

父亲说：“林彪也不是不会搞，他是不愿意搞。”

我问：“为什么呢？”

父亲说：“文化革命，林彪把他认为反对他的人都搞掉了，军队里都成了他的人。这种动大手术的事，一旦搞起来，又麻烦又得罪人，折腾的鸡飞狗跳墙的，不是把他自己的人搞乱了吗？那个时候，离9·13只有两个月，他要和毛泽东斗法，精神紧张得很，心也根本不在这些事情上。林彪手里的军权，是他政治上的本钱，要留着和毛泽东周旋。他怎么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去干这种事呢？”

原来是这样，“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看来，军队建设对统帅的要求，比军事才干、领导能力、专门知识更重要的，是立党为公的道德心。据说在延安时，朱总司令把《孙子兵法》里论“为将之道”的“智、信、仁、勇、严”，次序改为“仁、智、信、勇、严”，写成条幅送给

刘伯承作为他五十大寿的贺礼。这不论作为对刘伯承元帅的评价，还是作为一般的“为将之道”，都是至当至要的至理名言。“仁”字当先，不仅是爱兵，更是爱人民，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政治忠诚，这才是军队统帅最可宝贵的品德。

#### ◇ 辞去军职的情况有所不同

父亲谈起他辞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军职，情况却有所不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父亲挨了批，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党政职务，是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也就是说，是一年多以后的事。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父亲就去找小平同志，要求辞去他在北京军区担任的军职。

父亲说，当时小平同志还表示要挽留他。大概一方面是他和小平同志几年来一直相处得关系不错；一方面也有小平同志对匈牙利卡达尔的高级顾问讲过那段话的因素。但是，父亲坚决要求辞去军队的职务，小平同志也就同意他的辞职请求了。

当我问他为什么坚决要求立即辞去军职时，父亲说：“我在中央、也在军队干了这么多年了，能连这个道理也不懂？”接着他讲了小平同志的一段往事：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1975年的夏秋就揭开了序幕。开始，是刘冰告迟群、谢静宜的状的事，还有毛主席“评水浒”的事；后来，又是主席叫毛远新上政治局会议反映社会上“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事。

小平同志正在忙着搞整顿，先是铁路、再是钢铁，而后军队，接着是文艺、农业等，各条战线全面铺开；小平还说：各项整顿，最重要的是党的整顿。让父亲去搞试点，准备起草整党的文件。小平同志大概觉得，整顿是大事，迟群、谢静宜、毛远新说的那些事，只是些毛孩子的鸡毛蒜皮。小平同志去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回来以后说：没有什么事，主席还是信任我的。

可是，后来风头越来越不对了，主席指示要“帮助”小平同志，接着又指派了八个人专门开会批评小平同志，叫“八人批邓”会，父亲也在“八人”之列。过了年，周总理去世，华国锋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全党传达布署批邓。事情越搞越升级，一直到“四·五天安门事件”，毛主席把小平同志撤了职。

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可小平同志辞去军职的情况，一般人不太了解。父亲说：“八人批邓”开始后，小平同志的头脑，从热呼呼的“整顿”里冷静下来了，经过一段思考，邓小平清楚地判断：主席不信任他了。于是小平向主席提出辞去总参谋长的军职。毛主席随即同意了小平辞去军职的请求，但仍然让小平负责分管外交工作。小平同志辞去军职，是1975年底的事，比他被正式撤销党政职务，要早三四个月。

我自然不懂这些事，就问父亲：“军队的职务就那么敏感吗？”

父亲说：“掌握军权和当个文官的情况，当然不一样。掌握军权，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也不一样。”

这我就更不懂了，问：“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有什么不一样的？”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他讲了吴忠同志的一段故事：

“文革”期间，吴忠同志任北京卫戍区司令。这自然是一个要害岗位的关键角色，如果用人不当，在“文革”那样的情况下，危害是很大的。在同林彪、“四人帮”集团斗争的关键时刻，吴忠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毛主席称赞他：“吴忠有忠”。

中央清理“文革”的错误，吴忠同志也受到审查，用那个时候的语言，叫“说清楚”。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东线进展不顺利，许世友急得心脏病也犯了，就回来搬兵，找吴忠接替指挥。吴忠当时在广州军区任付司令，因为受审查还没有“说清楚”，在家中赋闲，正在喂鸡。

吴忠说：“让我上前线没问题，可是我还没有‘说清楚’哩！”

许世友说：“什么‘说清楚’不‘说清楚’，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你打了胜仗回来，不管什么问题，统统一笔勾销，就都‘说清楚’了！我给你打保票，到时候再‘说不清楚’，你来找我。”

吴忠上前线，抱了个必死的决心，坐在一辆坦克里，冲在最前方。可这样一来，对战场敌我态势，自然情况明、决心大、反应迅速、指挥得力。结果，谅山一仗，打得最漂亮。

从父亲讲吴忠的故事里，我明白了：在战争时期，掌握军权的人，如果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受到怀疑的话，他可以用打胜仗立战功和效命沙场以死报国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和平时期自然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且“一切行动听指挥”，军人总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就去挑起战争吧？这个道理是一目了然的。

有一次我向父亲介绍看过的一本书：苏联的政权结构，主要是三种力量，党、军队和克格勃。父亲评论说：中国和苏联不一样，我们的政权，主要是党。不过实际上，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比重也不小。有一条，我们还不如苏联，苏联军队的政治影响力，还主要在中央；我们的情况，军队在地方上也乱搅和，搞得党政部门过不成日子。文化革命，三支两军，把事情搞坏了。

我问父亲：文化革命时你在军队任职，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吗？

父亲说：当然有。三支两军的干部，又在军队任职，又在地方掌权，弄得谁也管不了他。北京军区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比较彻底：要么回部队，要留地方的，脱军装。不能一手握着枪杆子，一手又在地方党政部门抓权。

有一次，我谈到我在军队的同学也在做生意时，父亲说：这是小平决定的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搞经济，做生意，改革开放。这个事情，党内有阻力，如果军队再反对，事情就更难办了，就可能搞不起来。现在的办法，是把军队也拉下水，一块搞。这可以使改革开放减少阻力。小平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办法的危害，可军队的事，小平也是难哪。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新中国是革命战争胜利建立起来的，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比重较大，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形成的。不过这里有个“与时俱进”还是“与时俱退”的问题，一个波拿巴特式的政权，总不能算是现代化的国家吧。也许唯其如此，我们才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如果联系到我们党是执政党，所以我们的军队，实际上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样就和现代社会的国家政权“民权高于军权”的原理一致起来了。不过，“党指挥枪”，这还只是观念的约束，而不是有效的制度约束。在我们国家关于政治生活的法制尚待完备的过程中，就实际的情况而言，掌握军权者的自我约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应该抱定当年“为人民打天下”的革命宗旨，而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观念，这是一个军队统帅的政治道德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有过一些深刻教训可资借鉴，如张国涛和林彪，也有许多优秀传统需要挖掘、继承和发扬。——这是我从中体会的道理。

又提到他辞去军职的事情时，父亲说：这其实并不一定是你要怎么样，象林彪一样，想搞

什么图谋不轨的事情；你的部下，对你的人品、水平和能力看法会有不同，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拥护你的人，也可能是想由此得到升迁，而反对你的人，则可能想由取代而得到升迁；如果他们有些人头脑发热、鲁莽行事，军人是拿枪的，万一搞出什么乱子来，还不是要算到你的头上。华国锋就是不知道这种事情的厉害，后来搞出来个“三炮团事件”，如果那种事情闹大了，只会加重对他的处理。9·13事件有偶然性，如果林彪的事情不是那样的结果，而是跑到广州，搞成南北割据的局面，打起内战来，那国家可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乱子呢……。

父亲对我们说话，一向挺正统的，可是听这个话，还有点明哲保身的意思了。父亲谈起话来，时常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可是，他似乎不愿意对我多说这些事了。他以平日不多见的低沉的口气、而且一字一顿地说：“和一平一时一代，……军权，那是玩火！”

父亲说这句话时的口气和表情，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父亲的话里，我悟出的道理是：在和平时期，掌握军权的人，如果他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已经不被信任、受到怀疑、而且陷入政治是非的漩涡，而他还要贪恋权位、要为此搞点什么名堂、甚至不择手段的话，那是十分危险的。父亲说的“那是玩火”，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到头来，害党害国害人民，害人害友害自己。因此，掌握军权的人，如果处于政治逆境，在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政治忠诚方面，他能够为自己表明心迹的唯一方法，就是辞去军职。这是为党为国为人民，也是为人为友为自己。

对父亲当年的明智选择，我感到庆幸，也为他骄傲。宦海沉浮、世态炎凉、门前冷落之类的人情之常，又算得了什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以国家民族的安危为重，自己和家人也得以免祸，要重要的多。这种事情，倒往往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呢。

父亲谈的这些政坛往事，已经过去多年了；我们的国家，已经不是当年那种严峻而狂热的时代了。不过，我们的先辈历来有“资治通鉴”的优秀史学传统，在我们国家关于政治生活的法制建设还有待完备、尚未纳入现代国家的正常轨道之前，这些往事，也许还会有点借鉴的意义。有一句话，不仅适合于我们给日本人上课时作教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 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 2003年5月13日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